

清史圖典

清朝通史圖錄

第八冊

嘉慶朝

故宮博物院 編

朱誠如 主編



紫禁城出版社

清史圖典

啓功題



清朝通史圖錄

第八冊

嘉慶朝

故宮博物院 編

主 編

朱誠如

副主編

劉 潞 任萬平 郭玉海

本卷主編

趙 宏



紫 禁 城 出 版 社

2002.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史图典·嘉庆朝 / 朱诚如主编, 一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 2002.1

(清朝通史图录)

ISBN 7-80047-337-6

I. 清… II. 朱… III. 中国—古代史—清代—图集 IV. K249.0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6691 号

清史图典编辑委员会

主 任

朱诚如

副主任

刘 澍 任万平 郭玉海

委 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东玉 王思治 冯尔康 朱诚如

朱赛虹 任万平 刘 澍 李治亭

李 湜 严 勇 张玉芬 余同元

汪 元 周远廉 周京南 赵 宏

聂 卉 阎崇年 曹连明 郭玉海

喻大华

清史图典·嘉庆朝

故宫博物院 编

朱诚如 主编

赵 宏 本卷主编

紫禁城出版社 出版

(北京景山前街 故宫博物院內)

北京圣彩虹制版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制版

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发行

开本 850 × 1168mm 1/16

字数 73 千 图版 407 幅 印张 16.5

2002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7-80047-337-6/J · 165

定价: 165.00 元

清史图典总序

朱诚如

(故宫博物院教授)

《清史图典》是大型多卷本《清朝通史》的图录部分，意在以图片的形式连缀整个清朝的历史。

清王朝是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发展的鼎盛时期，是值得史家倾尽一生精力去研究的重要历史阶段。清朝上承明朝中晚期封建社会强劲发展，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急剧加强，经济领域出现崭新的资本主义的萌芽；下接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全面巅峰之后的社会转型，在内忧日益严重，外患与日侵淫的社会环境中开始了迈入近代化的门槛。长达268年的清王朝主宰中国命运时期，营造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夕阳辉煌：它开疆拓土，外御强敌，内弭反叛，封定藩属，奠定了今日中国版图的基础；它建立了封建专制主义的超级强权系统，以往封建朝代时断时续、相沿不衰的宦官专擅、外戚弄权、藩镇割据等蚕食皇权的派系毒瘤被彻底铲除，真正体现出一人决断，总揽朝纲的极端皇权威严；它编定了集中国数千年来的封建文化之大成的图书典籍，推出了体系纷呈、各树一帜的学术研究群体，培育了影响深远的文化大家；它改善了沿袭已久的中国封建农耕体制的经济模式，创办了具有资本主义因素的近代企业，逐步建立起适应近代资本主义的过渡体系，在一个封建因素积淀深厚的庞大国度开始了步履艰难的经济转型。大清王朝在其相对短暂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社会业绩。

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5000年文明历史年轮中，大清王朝统治华夏大地的时间不过区区的268年。但在这268年的时间里，清代社会文明经历了中国历史上最为激荡的变革时期。清朝勃兴的前期，当康熙帝派出精兵强将水陆并进会战雅克萨，阻断沙俄侵略中国东北的企图之时；当乾隆帝10次派遣大军靖边纾难，越境扬威之时——巅峰时期的中国封建王朝是一道屹立在东方的威严不可侵犯的长城。大清王朝经略海疆，在她的东南沿海连接了琉球、苏禄、安南、暹罗等藩属国家，建立了独特的藩属体制，成为领袖东方文明的中心。然而，岁月星河，枝蔓流变，盛世繁荣的背后，一场来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强大冲击已呈“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古老的王朝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难与困厄。大清王朝步入衰落的中后期，正是世界历史的18世纪，西半球欧美的土地上新近崛起了一批资本主义国家，在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之后，迅速开展了产业革命。蒸汽机的强劲动力、大机器的生产方式极大地催化了欧美国家的社会生产力，使其综合国力的发展呈现出一日千里的态势。而大清王朝缔造的封建文明虽然是农耕社会发展的顶级阶段，但与资本主义文明相比不在一个文明层次上，况且逐渐显露出疲态，无力保住数千年来社会文明领先的局面。当西方殖民主义者越洋而来，用炮舰轰开中国闭关锁国

的大门，迫使清王朝必须面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时候，几千年来积淀的封建文明顿时相形见绌，处于低级层次的封建文明几乎没有抗衡的实力。于是外战惨败、口岸开放、土地割让、外国公使驻京等一系列破坏王朝统治秩序、摧毁民族尊严的灾难降临了。天朝大门被打开，大清王朝一步步走向沉沦的深渊。

沉沦之中，民族脊梁迸发出自强不息的呐喊。晚清朝野中的开明绅士抛却天朝上国的自大心理，倾心学习西方的高新科技，试图举办洋务事业以拯救王朝危机，延缓王朝的沉沦。19世纪60年代起始，开明的封疆大吏、朝廷重臣陆续举办洋务企业，兴办洋务学堂，传播先进的科学技术。沿着这样一种势态发展下去，进入近代的中国在自强求新的道路上经历了从器物到理念的观念变迁，最终导致在世纪之初出现政治改革势力。这种革新势力前仆后继的启蒙与呐喊，不断催化转型时期的政治革新，引导中国走上政治近代化的道路。终于在1911年爆发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大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结束了中国社会沿袭2000多年的封建制度，迎来了尽管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但却符合社会发展潮流的民国时代。

整个清朝历史处于百年激荡的社会转型之中，展现出纷繁复杂、动荡多变的多彩画卷。《清史图典》（十二册）是大型多卷本《清朝通史》（十五卷、600万字）的图录部分，意在利用故宫博物院及全国各地收藏的包罗宏富的文物图片资料，连缀出简明清晰的历史线索，描绘出波澜壮阔的历史轮廓，全景般地再现出满族初兴、问鼎中原、囊括八荒、盛世繁华、闭关锁国、抗御外敌、艰难应变以及宇内风起云涌、王朝覆亡的整个历史，画龙点睛般地重现出重要的历史精彩瞬间，把昔日定格的照片、绘画、文物、书影、档案文献等单调孤立的图稿贯穿起来，凝结出清新鲜活、规制宏大的历史画卷。

与《清朝通史》采用的纪事本末体例略有不同，《清史图典》虽然也基本上以朝代划分卷次，但总体篇章结构是以历史的时间顺序为经，通贯全书的主体，以社会组织结构析分各个卷次的描述重点，使各个朝代的历史特点得以充分表现出来。《太祖 太宗朝》设置“源流篇”，长白山天池的烟雾缭绕，仙境朦胧；佛库伦沐浴吞神果感而受孕的满族远古神话传说，把清初的历史上溯到满族的母系氏族时代。不过，清初精彩的画卷展开自雄才大略的努尔哈赤以“遗甲十三副”起兵对抗明朝。统一建州，宏括女真，试兵辽西，叩打雄关，建立意在与中央政权比肩的古老王城赫图阿拉。残垣断壁的古城遗址，锈迹斑驳的铁盔甲冑，无不显现出八旗骑兵粗犷勇猛的铁流雄风。皇太极继承了努尔哈赤的遗愿，数次派遣八旗铁骑千里奔袭明朝内地，劫掠财物，袭扰城池，保持战略进攻的主动权。在内政方面，皇太极致力于八旗政权建构与完善，接受汉族先进文化的熏陶，使满族的社会发展出现突飞猛进的势头。

顺治帝承续了皇太极的余荫，迁都定鼎北京，皇极门前演绎了满族入主中原的精彩一幕。征伐李自成，讨剿张献忠，摧毁南明流亡政权。一篇篇历史内涵包罗宏富的旧照、遗物，勾勒出摄政王多尔衮挥动各路兵马席卷大半个中国，奠定统一多民族国家雏形的基本脉络。康熙一朝，“名曰守成，实同开创”，计擒鳌拜，独领皇权；西征叛乱，东收台湾，北控沙俄，平定三藩，协和蒙古；巡游江南，劝课农桑，启清朝盛世之先兆。览阅《康熙朝》的绚丽图画，颇觉盛世华章扑面而来。雍正帝承续康熙帝的余荫，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革除了康熙帝晚年倦勤遗留的社会积弊，打击政敌残酷无情，整顿吏治疾风骤雨，设立直隶于皇帝的军机处，控遏朝政于皇帝一人的股掌之上。于是，《雍正朝》里展示了皇宫大内的刀光剑影、血雨腥风，政坛风云的变化莫测，以及经济文化生活的谨严有序。继雍正朝短暂的整顿之后，迎来了中国封建文明辉煌的乾隆时代。乾隆一朝集中国封建社会的文明积累之大成，生齿迅猛繁衍，土地赋税丰盈，经济迅速发展。编订基本囊括古代文化典籍的《四库全书》，挫扼强敌，完收十全武功。《乾隆朝》的图画，规制庞大，气势磅礴，展现出江山万里、沧海桑田的雄浑气势，锦绣盛世的气度挥洒洋溢。乾隆朝底定了中国基本版图，迎来了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盛世辉煌。盛世过后即是平凡到了极点的平庸，嘉庆帝在乾隆帝巨人般的身影下，初期并不涉及政务，听凭太上皇越俎代庖，及至乃父故去，有重新振奋之心却无崛起之力。盛世遗产是矛盾丛集，积弊甚深的社会难题，嘉庆帝尽管力图以勤政挽回颓势，但大势已去。于是《嘉庆朝》呈现出的历史遗存平淡无奇，很难找到能够凸显嘉庆一朝的历史文物和图卷。镇压白莲教起义算是嘉庆一朝的大事，但动用16省的军队，糜费2亿两的银饷，耗尽了乾隆帝勤恳持政积累的家底。嘉庆朝末期，国库空虚，帅老兵疲，政治混沌，主上平庸，仅仅20余年间大清王朝就已经呈现出衰败之象了。以至于继位的道光帝在清朝12帝中是名载史册的“吝啬鬼”，简约节省，握拳渗水。然而，如此简约自律也不能保障大清王朝延续下去。1840年，英国殖民主义者依靠坚船利炮轰开中国的大门，道光帝惜钱如金，小败即止，宁可签订屈辱的《南京条约》，洞开南中国门户。《道光朝》历史的图片表明，早年端起鸟枪冲锋在前勇退天理教的少年皇子，在强敌压境之际泯灭了杀敌勇气。割地赔款，开放口岸，天朝的崩溃使道光帝感到死后愧见列祖列宗，遂自我处罚：嘱死后不再配享太庙。道光帝撒手人寰，留给其子咸丰帝的是外敌入侵，江山残破；财政困窘，捉襟见肘的废烂局面。资质鲁钝的咸丰帝施政乏策，调遣无力。南方太平天国势焰正炽：定都天京（南京），北伐西征，长江中下游已不再为大清皇帝所控制。而英法列强二次入寇，溯海北上，登陆北塘，火烧圆明园，硝烟弥漫了北京城。困厄交织，咸丰帝亡故避暑山庄，慈禧太后借机发动宫廷政变，进而两宫垂帘听政，晚清政治由此进入了太后主政时期。浏览《咸丰 同治朝》的黑白世界，战火纷飞，政坛纷纭，主忧民困，水深火热，充满了乱世纷扰、抑郁难舒的困蹙氛围。同治帝天花夺

命之后，幼冲之龄的载湉入继大统，是为光绪帝。光绪一朝，列强频频扣打中国的大门，几乎每隔十年就发动一次侵华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日俄战争接踵而至，直至1900年八国联军再次攻掠中国的都城北京，自行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自西安回銮的慈禧太后放言：“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彻底泯灭了抗拒之心，沦落为帝国主义列强的附庸。光宣时期，西学东渐已历数十载，外部意识的侵淫已经渗透进中国社会的肌体，以往社会的传统模式遭到了巨大冲击，催化出传统封建社会所没有的社会因子。中国封建社会在历经2000多年的发展历程之后，已经走到了脱胎换骨、鼎新革故的转型时期。为自强图存拯救王朝，朝廷的部分封疆大吏、阁老重臣举办近代新式工业，创办新式学堂，甚至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念之下尝试改良传统政治结构——推出变法维新运动，试图借鉴中国封建社会历次变法图强的举措，延续大清王朝的统治生命。然而，极端专权的慈禧太后，呆板僵化的调控秩序已经失去了自我调节功能的弹性。当“戊戌六君子”洒血菜市口，光绪帝被幽囚瀛台时，大清朝廷舍弃了可能成为延续政权的回旋力量。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始以推翻清王朝为目标点起了南国边陲的烽烟。这种暴力挑战步伐迅速超越了大清王朝自身的“新政”步履。武昌起义一声枪响，十三省份通电响应，清朝统治即刻土崩瓦解。封建王朝终结了，中国步入了纷乱失序却又充满希冀的新时代。浏览《光绪 宣统朝》的张张图片，在体验岁月尘封的多味瞬间的同时，社会发展翻天覆地的惊人变迁给人以强烈的永久的震撼。

以图证史，利用各种实物附带的鲜活历史信息丰润后人对于历史的描述，弥补语言描述与真正历史内涵之间的差异，是我们编辑此书的初衷。近300年的清朝历史遗留下来了卷帙浩繁、汗牛充栋的文献资料，风蚀水浸、数不胜数的文物藏品，尘封失记、内容隐约的书影旧照，以及久历岁月消融却依然古韵犹存的宫闱建筑，给了我们以广阔的清理析分空间。然而，在庞杂纷乱、良莠四陈的资料海洋中，去粗取精，剔伪存真，提炼主题，深究图题背后隐藏的历史内涵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使命，我们微薄之力稍有不逮。由于个别主题资料的稀密差别非常之大，尽管在清朝的历史长河中占居非常重要的地位，但资料的匮乏使我们只能暂时付诸阙如，留待日后再版修补。虽然如此，我们仍然希望本书能够与《清朝通史》相得益彰，给广大读者以思虑深刻的宏观历史的理性内涵，形象生动的微观历史的感性表征。是否能够达到这样一种效果，我们期待着学界专家、一般读者的批评指正。在本书杀青即将付梓之际，我作为本书的总主编缀就以上文字，即为本书序言。

2001年8月1日

北京 故宫博物院

嘉庆朝序言

张玉芬

(辽宁师范大学教授)

嘉庆朝处于清代历史上一个重要而又特殊的历史时期。在它之前，是名为盛世的康乾时代，在它之后，是在鸦片战争中签订屈辱城下之盟的道光朝。嘉庆朝处于清代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清仁宗爱新觉罗·颙琰，生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十月，为高宗第15子。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被密建为皇储。乾隆六十年(1795年)九月被正式册立为皇太子。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接受高宗内禅，即帝位。

高宗禅让帝位后，称太上皇，以训政名义继续掌控朝政。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高宗病逝，嘉庆开始亲理朝政。

清王朝经过康、雍、乾三代的“励精图治、开疆拓宇、四征不庭、揆文奋武”之后，建立起一个封建大一统帝国。在这个大帝国中，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内部相对稳定和安定，封建经济在经过明末清初的严重破坏后，获得了恢复和发展，国家财政相对较为宽裕，康乾时代因而被称为盛世。然而，到了乾隆末年，盛世之谓已经名不符实。当时的社会现实是：土地高度集中，民生困顿，吏治败坏，军备废弛，阶级矛盾极端尖锐，清王朝面临严重的统治危机。

乾隆朝留给嘉庆朝的就是这样一份遗产。显然，嘉庆面临的已不是什么盛世，而是一个矛盾丛集、问题成堆的正急剧走向没落的衰败之世。

和珅势力的覆亡

和珅，字致斋，满洲正红旗人。初为“少贫无籍”的普通官生。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被挑选入銮仪卫，充当皇帝轿旁的侍从。在其后的20年中，和珅逐渐由一个小侍从，一跃成为集军、政、财、文大权于一身，“宠任冠朝列”的朝廷重臣。在乾隆训政时期，和珅更成为出纳帝命，统率百僚，综理朝政的“二皇帝”。和珅当政期间，明目张胆地贪渎营私，婪索受贿，巧取豪夺，成为乾隆中后期官场贪污婪索之风盛行的源头之一。和珅当政时，恃宠威福，结党营私，排斥异己。对不愿阿附之人，必乘乾隆暴怒时构陷之，对纳贿结交之人，倘有过失，或巧为周旋，或缓其事，待乾隆怒气平息后为其解脱。和珅私党因此遍天下，内而公卿，外而封疆大吏，皆出其门。和珅利用遍朝私党把持朝政，揽权枉

法，导致乾隆中后期，朝廷纲纪堕废，内政疲败。乾隆晚年，和珅在乾隆“善忘比剧，昨日之事，今日辄忘；早间所行，晚或不省”（《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卷一二）之际，飞扬跋扈，恣行无忌。或以腿疾为借口，乘椅轿入大内，肩舆出入神武门；或借口乾隆拟旨字迹未真，撕去谕旨，另行拟旨。和珅甚至在盖建私邸时，大肆僭侈逾制；于直隶修造坟墓时，居然设立享殿，开置隧道，被附近居民呼之为“和陵”。嘉庆嗣位后，和珅“以拥戴自居，出入意颇狂傲”（昭槁：《啸亭杂录》卷八，《苏相国》），大有“乘高宗昏耄”，“挟太上皇帝号令皇帝之势”（《嘉庆三年太上皇帝起居注》）。乾隆禅位前后，和珅种种“专擅犯悖”、“跋扈不臣”的恶行劣迹，严重侵犯了皇权的尊严。

为了遏制弥漫朝廷的贪污腐败之风，整肃朝纲，整顿吏治；为了维护皇权的尊严，稳定王朝的统治，亲政后的嘉庆皇帝，决定把清除和珅及其党羽作为革新朝政的第一件大事。嘉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和珅及其党羽采取了行动。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四日，嘉庆宣布褫夺和珅军机大臣、九门提督等衔，命其与福长安守值宿殿，不得任意出入。

正月初五日，嘉庆颁发求言之诏。诏求直言，是嘉庆亲政后革新朝政的一个重要措施，实际也是一纸动员令，要求王公大臣、九卿科道参劾和珅，以期获得和珅的更多罪证。

正月初八日，嘉庆以科道纠劾为由，褫夺和珅、福长安职，并将他们拘捕下狱。同时，令王公大臣公同鞠训，臚列罪状。

正月十一日，公布和珅罪状。首次公布的和珅罪状主要包括：和珅飞扬跋扈、目无君王；延搁军报，贻误军国重务；贪渎营私、僭侈逾制等。嘉庆在公布和珅罪状时，及时提醒鞠训的王公大臣，要着重追究和珅“丧心昧良，目无君上，贻误军国重务，弄权舞弊，僭妄不法”的罪行，其“贪婪无厌，蠹国肥家，尤属罪之小者”。

正月十二日，嘉庆将各科道纷纷密奏和珅、福长安罪状时却无一言举劾的和珅死党吴省钦，交部严加议处。罪名是“身为台长，不知政体，惑于邪言，妄行渎奏”。吴省钦曾为和珅老师，只因后来吴在考进士时，和珅是殿试读卷官，竟恬不知耻地反认和珅为师。为取媚于和珅，吴省钦甚至不惜卖友求荣。当陕西监察御史曹锡宝于乾隆末年纠劾和珅管家刘全时，曾将纠劾之疏拿给同乡吴省钦看，意在征求吴省钦的意见。吴省钦竟立即驰告正在热河行在陪同乾隆巡幸的和珅，使和珅得以预先大作手脚。吴省钦被交部议处，是嘉庆惩处和珅死党的重要举措。

正月十三日，嘉庆又处分了山东巡抚伊江阿。乾隆死后，嘉庆在批阅伊江阿奏折时，发现其中夹

有寄和珅之信，谆劝和珅节哀办事，充满了关切慰问之情；而对嘉庆则仅照常具一请安折，节哀之类无一字提及。嘉庆忿忿不平，认定伊江阿“平日不知有皇考，今日复不知有朕，惟知有和珅一人”。严词谴责伊江阿“负恩昧良，莫此为甚”！下令对伊江阿“传旨严行申饬并交部严加议处”。

正月十四日，下令将吴省钦革职回籍。

正月十五日，嘉庆再次公布经朝臣不断纠劾得到的和珅罪状，共20款之多。

正月十八日，嘉庆宣布了对和珅、和珅亲属及其党羽的处理决定。嘉庆认为和珅罪大恶极，于法实无可贷，照大逆律凌迟处死并不为过。即使不照大逆律凌迟处死，按照和珅貽误军国重务之重罪，亦应参照乾隆因讷亲貽误军机而将其于军前正法的成例，将和珅处斩。考虑到当时正是为乾隆服丧期间，将其辅政重臣抛尸街头，总不够妥当。又念其曾任首席大臣，嘉庆决定于万无可贷之中，对和珅网开一面，“免其肆市”，“加恩赐令自尽”。同时还宣布了对福长安的处理决定。福长安系满洲镶黄旗人，亲贵名臣之后。福长安在乾隆朝积官至正红旗满洲副都统、武备院卿，领内务府，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乾隆又命其在军机处学习行走，嘉庆三年(1798年)被封为侯爵。福长安在与和珅长期共事中，意气相投，联成一党，在朝廷里排斥异己，贪赃营私。当福长安被革职拿问后，在对其家产进行查抄时，发现福长安的家产虽不及和珅，但也有许多不该拥有之物。嘉庆因此以福长安与和珅“扶同徇隐”、“肆意贪婪”之罪，决定照大学士等所请，按朋党律拟斩。然而，福长安之罪究竟不及和珅之罪，既然和珅已被加恩赐其自尽，再将福长安问斩则有些过分。最后决定改为斩监候，秋后再行处决。福长安虽然逃脱了眼前的死运，一个使他丧魂失魄的场面却正等待着他。嘉庆令将福长安押往和珅监所，跪视和珅自尽。其后，又被押回原狱监禁。

对和珅亲属，嘉庆作了以下处分：革去和珅之弟和琳公爵衔；将和家所立专祠一并拆毁；和珅子丰绅殷德之妻为乾隆最爱之女和孝公主，特曲加体恤，准丰绅殷德袭和珅伯爵衔，但也给予种种限制，如只准在家闲住，不准外出滋事等；革除和琳子丰绅伊绵公爵衔，并斥退侍卫，不准在乾清门行走，仅加恩赏给云骑尉，回本旗当闲散差使。

在和珅党羽中，其姻亲大学士苏凌阿被令以原品退休。和珅亲信李云光被以原品休致；吴省兰、李潢被降为编修。撤销吴省兰学政，令他不必要在南书房行走。

嘉庆在乾隆死后的十余天里，使狂傲不可一世的和珅命归地府，使仗势作威作福的和珅亲信党羽被囚被黜。和珅柄政近20年，所管衙门众多，由其保举升擢者亦众；外省官员，在和珅权势薰天时，奔走和珅门下，逢迎行贿输忱者，更不可胜数。和珅被诛后，那些过去或多或少与之有关的人，这时不免

惴惴不安起来。为了稳定政局，妥善了结和珅一案，三月十九日，嘉庆郑重宣布：和珅一案“业经办结”，除重治和珅而外，“不肯别有株连，惟在敬戒将来，不复追究既往”。他要与和珅有牵连的官员“无庸心存疑惧……若能迁善改过，皆可为国家出力之人。既有从前热中躁进，一经失足，但能洗心涤虑，痛改前非……仍可勉为端士”。嘉庆同时告诫那些企图借和珅一案大兴政海风波的官员：不要“过事搜求，尚复攻击阴私，摘发细故，或一二人、一二事以实其言，则举之不胜其举”，这样做的结果，必将“启告讦报复之渐，是除一巨蠹，又不免流为党援门户陋习，殊非朕之本意”。对于那些与和珅关系密切又不思悔改的官员，嘉庆则对他们提出严厉警告：“经此番训饬之后，尚不知改悔，勉立修名，则是自甘暴弃，不齿士类，必当严加惩治，毋谓教诫之犹豫也”（《清仁宗实录》卷三八）。此谕一下，平日趋附和珅者，始无疑惧之心，人心乃大安。事实证明，嘉庆的这道上谕，在办理和珅案件中起了重要作用。正是嘉庆所宣示的“不肯别有株连”的明智政策，才做到了在嘉庆以极端手段处理和珅时，“皇城之内，晏如平日，少无惊动之意”（《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12册）。

嘉庆诛和珅，从巩固、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来说是必要的；从整饬内政、整肃纲纪来说也不失为行之有效的办法。然而，在封建社会走向没落，清王朝的统治已走向衰败时，诛灭一个和珅，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整个社会和王朝的统治危机。

屡仆屡起的人民反抗斗争

乾隆末年，社会迅速走向衰败。与社会衰败相伴而生的，是全国范围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迅速激化。嘉庆一朝，始终处于农民起义的暴风骤雨中，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不遗余力地镇压屡仆屡起的农民起义，成为嘉庆朝政的最为重要的方面。

在贯穿整个嘉庆朝的农民起义中，爆发于乾隆末年的白莲教起义规模最大，对嘉庆朝的打击也最为沉重。

川楚陕农民大起义是以白莲教为纽带，经过长期的酝酿、宣传、组织发动起来，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湖北荆州、枝江、宜都的白莲教首领聂杰人、张正谟等，在“官逼民反”的口号下，首先举起了反抗大旗，湖北各地民众纷纷响应，起义迅速由湖北向四川、河南、陕西等省蔓延。

迅猛发展的白莲教起义，使清廷惊恐万状。太上皇立即调兵遣将，全力展开对起义军的围追堵截。起义军毫不退缩，迅速扩大活动范围，避开敌人主力，“不整队，不迎战，不走平原，惟数百为群，忽

分忽合，忽南忽北”(魏源：《圣武记》卷九)，活跃在湖北、四川、河南、陕西等数省广大地区。起义军所到之处，穷苦农民纷纷加入，农民起义的烈火越烧越旺。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乾隆带着对起义军的刻骨铭心的仇恨死去，将镇压白莲教起义的遗愿和一个日渐衰败的王朝一同交给了继位者嘉庆。

嘉庆亲政后，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对起义军的镇压。

诛和珅、清除军中积弊，是嘉庆采取的第一个重要措施。嘉庆认为，白莲教起义历经三载尚未荡平，完全是因为和珅“压搁军报，有心欺隐，各路军营，听其意指，虚报首级，坐冒军粮”，以致“军务日久未竣，贻误军国”(《清仁宗实录》卷三八)。嘉庆毫不手软地诛灭了和珅，立即着手解决军中将领及督抚大员的冒功侵饷问题。嘉庆四年八月，襄阳道胡齐仑因冒功侵饷，被逮交刑部审讯，其家产被籍没。胡齐仑被处绞。受贿的统兵将领明亮、永保、庆成、鄂辉等人被处以籍没家产。为了及时掌握军饷的使用情况，嘉庆采纳了陕甘总督松筠提出的“令各路粮台按旬开报，按月汇奏”的办法，扭转了军饷支用的混乱情况。这样就使财政已陷入困境的清廷，有可能将军饷最大限度地用于围剿战争。

更易统兵大员，严惩不力将吏，严密军事部署，是嘉庆加速围剿起义军的又一重要措施。嘉庆亲政后，针对各路军营无所统属，将领各怀自私自利之心，争功诿过之事不断发生的情况，授原总统四川军务的勒保为经略大臣，赐以印信，规定各路带兵大臣悉受节制，“以一事权”。继而，又以“经略半载，莫展一筹”等罪名，将勒保逮问治罪。其经略事务，以将军明亮代之。不久，又以明亮行动迟延，将其免职，卒以都统额勒登保代之。半年之内，嘉庆三易统兵大员。通过更易统兵大员，严惩不力将吏，使运转不灵的战争机器迅速运转起来。

实行剿抚兼施的两手政策，是嘉庆镇压白莲教起义的重要手段。清廷镇压起义历久不能奏效的事实，迫使嘉庆不得不改变乾隆实行的单纯军事围剿政策，采取剿抚兼施的两手政策。一些为官清廉，官声尚好的官员则被嘉庆视为推行剿抚兼施政策的得力工具被优擢任用。事实证明，嘉庆“害民之官必宜去，爱民之官必宜用”的政策，对推行剿抚兼施政策确实起了很大作用。当时，四川广元县知县刘清、巴县知县赵华、渠县知县吴桂均被破格保荐。这些久负清名的官员，被破格提拔，忠实执行嘉庆的两手政策，他们在嘉庆的招抚绥靖政策中所起的作用是其它措施无法与之相比的。

然而，尽管嘉庆的招抚安置政策对促使起义军的分化瓦解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并没有产生预期的那种“翕然来归”的效果，结果是“虽有招抚之空谈，总未能收解散之实效”(《清仁宗实录》卷四一)。恼羞成怒的嘉庆继而发布了一道道残酷的围剿令，声称“看来此等匪徒，怙恶已深，愍不畏死，势难藉招抚为解散之计，惟有痛加剿杀，划尽根株”(《清仁宗实录》卷五八)。其实，嘉庆提出的剿抚兼施政

策中的剿和抚都是服务于迅速将农民起义镇压这同一目标的，二者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血腥镇压始终是被置于首位的。

实行寨堡团练的坚壁清野政策，是嘉庆为平定白莲教起义提出的各项政策中最为毒辣，而成效最为显著的一项政策。所谓坚壁清野，即“并小村入大村，移平处就险处，深沟高垒，积谷缮兵，移百姓所有积聚，实于其中。贼未至则力农、贸易，各安其生；贼至则闭栅登陴，相与为守”（《皇朝经世文编》卷八九）。

由于嘉庆在亲政后，针对清军积弊和起义军本身的弱点，采取了一系列新举措，使起义军遭遇到极大困难，力量逐渐削弱。在嘉庆五年的下半年，许多著名的义军首领相继被捕和战死，起义军不得不向川、陕、楚三省交界的南山、巴山老林深处转移，坚持斗争。对于这些拒不接受招抚，誓与清王朝斗争到底的起义军，嘉庆已无宝可祭，只得用重金悬赏的办法来捕杀义军首领。在悬赏缉拿义军首领的同时，又不断督促经略额勒登保与参赞德楞泰，率军分路会剿。起义军面临的形势更加险恶。至嘉庆六年（1801年）二月，起义军活动范围日渐缩小，人数锐减至24000余人。

然而，起义军没有放下武器，他们出没于丛山老林中，游击于清军力量薄弱地带，“陕剿急则入川，楚剿急则入川陕”。前赴后继，“即歼毙首逆，而去一人，复立一人”。嘉庆六年六月，清军各路将领于山西平利举行会议，确定了分兵合击的策略。德楞泰由西南逼攻，而额勒登保则由东北邀击，两路会剿于三省之交。德楞泰还分选兵勇，每200为队，“冒教匪服色、旗号，以降贼为乡导，或佯为合队，或乘夜袭营”。起义军被内外夹攻，损失更为惨重。至十月，起义军仅余一万多人。急于求胜的嘉庆限令额勒登保于这年冬天将起义军悉数歼灭。起义军不屈不挠的斗争粉碎了嘉庆的美梦。嘉庆七年（1802年）正月，活动于川北的起义军首领苟文明联合其他零散起义队伍，聚众2000余人、骡马数百，渡嘉陵江上游之略阳河进入川东。自以为已稳操胜券的嘉庆，因此而大动肝火，以惩办统兵将帅泄其愤。同时，又给额勒登保立下“限六月内灭贼”的命令。额勒登保倾全力率军扑向起义军活动地区。义军首领樊人杰、苟文明等相继牺牲。但六月限期已过，起义军仍活动于丛山峻岭中，不断袭击清军。嘉庆七年（1802年）十一月，当起义军的著名首领大部分被俘或战死后，起义军尚余千余人。这一年十二月，以经略额勒登保为首的将帅会同川、楚、陕三省地方大员，以大功戡定奏报嘉庆报功请赏。嘉庆获报大喜过望，立即“祭告裕陵，宣示中外”，对有功诸臣，论功行赏，大批清军撤离了川、楚、陕。然而，嘉庆始料不及的是，在川、楚、陕三省交界处的起义军余部，乘清军纷纷撤离之机，纷纷突出老林，四处活动。而大批乡勇与起义军的联合，使濒临失败的起义军大有重振雄威的势头。清王朝在

宣布“彻底肃清”后，裁撤大批乡勇。每名乡勇规定由官府给银五钱缴刀矛，银二两资送回籍。但是，绝大多数乡勇原系贫无立锥之地的流民，他们本无家可归，无田可耕。这样，被遣散的乡勇进入深山老林，和义军余部结合起来。而这时的起义军余部，人数虽不多，但皆历经百战之余，有丰富的与清军作战周旋的经验。且“具悉官军号令及老林径路，忽陕忽川，忽聚忽散”（魏源：《圣武记》卷一）。使清军剿不胜剿，防不胜防。统兵大员们一时束手无策，“大军遏之则不利，大队趋之则免脱，仅余二三百贼而三省不得解严”（王先谦：《东华录·嘉庆》卷五）。嘉庆九年（1804年）二月，还京不久的额勒登保再次以钦差大臣头衔赴陕，会同德楞泰共负围剿之责。至这年九月，各路皆已肃清。实际上起义军的活动仍没有停止。直至嘉庆十年（1805年）五月，起义军的最后一个元帅王世贵牺牲，川、楚、陕农民大起义归于失败。

历时九年、遍及五省的白莲教农民起义被残酷地镇压了。清王朝为镇压起义，先后调集了全国16个省的兵力，耗费白银2亿两。清政府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损失一、二品高级将领20多人，副将、参将以下军官400多人。清政府的军事力量因而受到极大削弱，清王朝受到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清王朝镇压川、楚、陕农民起义久久不能奏效的事实，充分暴露了清王朝外强中干的本质。所谓康乾盛世也落下了帷幕，从此，这个王朝走向衰落的趋势益发不可遏止。

乾隆年间，边疆地区民族矛盾也逐渐尖锐起来，终于导致了边疆少数民族的反抗斗争。乾隆六十年（1793年）正月，黔省松桃厅大塘苗民石柳邓集众举义，永绥厅黄瓜寨苗民石三保等闻风响应。在起义苗民进围乾州城后，好大喜功的乾隆令云贵总督福康安率军进剿，令四川总督和琳驻扎酉阳，相机协剿。清政府来势汹汹的镇压，激起苗民更大规模的反抗。起义军击毙清军将领多人，攻占保靖、酉阳、秀山、松桃、铜仁等地。湘、黔、川同时告急，清廷调集数省十万大军，大举镇压。福康安“惑于幕客言，欲养贼自重，以邀封拜，乃顿兵不进，与川督和公琳日夜饮酒听乐”（昭槁：《嘯亭杂录》卷七，《傅厚菴》）。苗民起义军依靠山崖险阻，抵抗清军，使之“不能寸进”。福康安、和琳染疾死于军中。其后，清廷派遣明亮、鄂辉赴湖南，接统军务。嘉庆元年，川楚陕白莲教起义爆发，清军不得不分兵应付迅猛发展的白莲教起义军。苗民起义军坚持斗争，嘉庆元年十二月，起义军首领石柳邓牺牲，清廷匆匆宣布“藏功”。其实，苗疆问题并没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嘉庆亲政后，任命凤凰厅同知傅鼐总理苗疆事务。傅鼐提出的“置堡练勇、坚壁清野”之策，解除了苗疆危机。

镇压了白莲教起义，平定了苗疆，并没有使嘉庆朝获得安宁。福建同安人蔡牵领导的起义军，自嘉庆五年即萌发于闽浙沿海，力量逐渐壮大。嘉庆九年（1804年），起义军战船80余艘，进入福建沿海。

嘉庆十年(1805年)冬,起义军聚集战船百余艘,率众2万余进攻台湾,自号镇海王。嘉庆调兵遣将,直至嘉庆十五年(1810年)二月,才镇压了蔡牵起义军,度过了又一次危机。

东南海疆的警报刚刚解除,嘉庆十八年(1813年),对清王朝造成更大威胁的天理教农民起义又在中国北方、清王朝统治的心脏地区爆发了。

天理教又名八卦教,原白莲教的一个支派。直隶大兴的林清和河南滑县的李文成是著名的天理教教首。林清于近畿一带秘密宣传发动群众,尤其注重联络宫中低级太监入教。李文成活跃在直隶、山东、河南一带,拥众数万,势力最盛。林清、李文成南北呼应,积极准备发动起义。嘉庆十七年(1812年)正月,各地教首聚会河南滑县道口镇。决定明年九月十五日午时起事。约定届时李文成首先于河南发动,河南、山东、直隶各地即时响应,各路起义军会合直捣幽燕。林清则潜发于北京城内,在宫内太监接应下,直捣内廷,内外配合,首先夺取北京城。李文成的活动被官方侦知,滑县知县逮捕了李文成等24人。天理教的其余首领被迫提前于嘉庆十八年(1813年)九月初七日发动,攻进滑县县城,封官拜将。起义军因受到清军四面阻遏,未能如约北上。蛰居京畿的林清没有等待北上援军,在原定日期的九月十五日午刻开始行动,林清将教徒200余人分为东、西两队,分别由东华门、西华门向紫禁城发动进攻。攻进内廷的起义军与清内廷侍卫和闻讯赶来的火器营官兵展开了一场力量悬殊的生死搏斗。起义军很快陷入众寡悬殊的绝境,被擒被杀者70余人。当北京城内这场惊心动魄的搏斗发生时,嘉庆正行围热河,不在京师。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嘉庆才得到奏报。嘉庆对于“汉唐宋明未有之事”竟发生在大清内廷感到十分震惊。奇耻大辱化作了对起义军的无以复加的仇恨,嘉庆令于京城及京畿进行大搜捕,对“其三品以下官员以及军民铺户人等俱著逐户挨查”(王先谦:《东华录·嘉庆》卷一一)。林清于黄村被捕。十九日,嘉庆还宫,于瀛台亲讯林清及内应太监,“皆磔之,传首畿内”(魏源:《圣武记》卷一〇)。天理教起义军进攻皇宫的壮举被嘉庆淹没在血泊中。然而,隆宗门匾额上至今仍残留的箭簇痕迹,是中国农民群众英勇无畏地反抗清朝封建统治的见证。

进攻皇宫的起义军被镇压了,但燃及河南、直隶、山东的天理教起义仍在迅速发展。直至这一年年末,起义军的最后一个据点滑县县城被清军攻陷,起义军2万余人在血战中牺牲,起义军首领或战死,或被捕,天理教起义陷于失败。

综览嘉庆一朝,人民的反抗几乎没有停止过,这正是当时社会阶级矛盾极度尖锐化的反映。嘉庆企图以对农民起义的残酷镇压来挽救统治危机,然而,压迫愈重,反抗愈烈。嘉庆对人民的血腥镇压,只会激起人民更大规模的反抗。嘉庆朝历久不衰的人民反抗浪潮,预示着清王朝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的命运。

内政的疲败及其整顿

从整个朝政来说，困扰嘉庆朝的严重问题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内政的疲败，二是内乱的频仍。在嘉庆二十余年的政务活动中，曾下大力气整顿内政，力图通过对朝政的整肃来遏制清王朝走向衰败的趋势，恢复清前朝鼎盛局面。嘉庆朝对内政的整顿大体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诏求直言，广开言路，祛邪扶正。

嘉庆于亲政之日即颁发谕旨，要求“九卿科道有奏事之责者，于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封章密奏，俾民隐得以上闻，庶事不致失理，用副集思广益至意（王先谦：《东华录·嘉庆》卷二）。不久，嘉庆又作了不罪言者的保证，并重新处理了乾隆中后期因直言获咎的曹锡宝案和尹壮图案。嘉庆盛赞曹锡宝在“和珅声势薰灼，举朝无一人敢于纠劾，而锡宝独能抗辞执奏，不愧诤臣。今和珅治罪后，并籍全家。是锡宝所劾不虚，宜加优奖”。嘉庆决定加恩追赠已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含冤而死的曹锡宝副都御史衔，并破例给“其子江视赠官予膺”，“以旌直言”（《清仁宗实录》卷三八）。对于不畏权贵和乾隆淫威，敢于对盛世表象掩盖下的社会现实加以抨击和揭露的尹壮图，大加褒扬，认为这样的“敢言之臣”是应该加以重用的。嘉庆亲政后，命其“即行来京候旨擢用”。嘉庆的举措，深孚众望。嘉庆初政呈现出“下至末吏平民，皆得封章上达，言路大开”的局面。

其二，诏罢贡献，黜奢崇俭。

嘉庆亲政后，力戒乾隆朝骄奢淫逸之风，诏停贡献，申明：“此等古玩，饥不可食寒不可衣……朕视之直如粪土也。朕之所宝者，惟在时和年丰，民物康阜，得贤才以分理庶政，方为国家至宝耳……再年节王公大臣督抚等所进如意，取兆吉祥，殊觉无谓。诸臣以为如意，而朕观之，转不如意也，亦著一并禁止”（《清仁宗实录》卷一三）。当嘉庆得知由新疆叶尔羌为进贡而采集的大块玉石，正在异常艰难地运往北京时，立即令将“所解玉石，行至何处，即行抛弃，不必前解”（《清仁宗实录》卷三八）。为了遏制奢侈之风，嘉庆遵照师傅朱珪“君心正而四维强，朝廷清而九牧肃，身先节俭，崇奖清廉，自然盗贼不足平，财用不足阜”的教诲，“躬行节俭为天下先”，力图为各级官员作出榜样，为新朝营造一个新气象。所以他拒绝捐廉修理盛京夏园行宫，规定在巡幸五台山时，不准预备途间及山之上下一应戏台、杂伎、假山、假亭一切点缀，庙前不准设戏台演戏。

其三，力戒官员欺隐粉饰怠惰之风。

嘉庆亲政后，面对阶级矛盾极端尖锐的社会现实，注重了解民情、民隐。然而当时许多地方官员，

为了博取皇帝的青睐，往往热衷于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甚至讳灾不报，造成严重后果。嘉庆五年(1800年)一月，云南威远一带水灾严重。井灶、民房、衙署、盐仓皆被冲塌，被灾百姓、盐工 3400 余丁口，冲坍房屋 1400 余间。云南巡抚江兰对这样严重的灾情却隐匿不报。特别恶劣的是，在嘉庆派人已经对灾情查证确实后，江兰仍不据实陈奏，反称被灾地区收成十分丰稔。嘉庆非常恼怒，认定江兰存心讳灾不报，纯属“玩视民瘼”，立即将其革职，令其即行回籍。两年后，嘉庆又将隐瞒山东严重蝗灾不报的山东巡抚和宁以溺职例革职。嘉庆九年(1804)六月，“平日办事尚为认真”，颇得嘉庆好感的直隶总督颜检，以欺罔、粉饰之罪，被交部议处。颜检先是在麦子尚未收割时，就预为铺陈，先说大话，说直隶小麦可获“十分”收成。嘉庆对颜检预报产生疑问：“十分乃系上稔，岂可多得……实未免措辞过当。”颜检继则隐瞒直隶蝗灾灾情和由蝗灾造成的损失情况。当嘉庆在宫禁中发现了飞蝗，令颜检查明直隶境内蝗灾情况而后复奏时，颜检在奏报中却说：直隶蝗虫现已捕扑尽净。还说飞蝗不伤禾稼惟食青草。嘉庆已经掌握了蝗灾造成损失的情况，仅在广渠门外，田禾被蝗虫吃掉的已有十分之四。至于说到直隶境内的蝗虫已被捕扑尽净，嘉庆认为更属弥天大谎了。因为嘉庆自己在宫中披阅奏章时，飞蝗竟然落在御案之上，太监一下子就捕捉到 10 余只。宫禁既有飞入者，那么郊原田野不知更有几何？嘉庆决心对谎话连篇的颜检加以惩治。

内政的疲败是清王朝走向衰落的重要标志。嘉庆当政期间，虽力图通过告诫、惩治，乃至率先垂范，来遏制弥漫官场的奢靡、怠惰、矫饰等恶劣风气，达到弊绝风清、重振纲纪的目的。事实证明，嘉庆这些有限的整顿措施，并没有能使疲败的内政得到根本改观。

对外关系

嘉庆统治下的中国，当时已面临资本主义侵略的危险。传统的闭关锁国政策使统治者对外部世界缺乏必要的了解，嘉庆是在懵然无知中被历史置于与资本主义列强交涉的舞台。在嘉庆朝的对外关系中，首先是如何对待鸦片流毒的问题。

从乾隆朝以来，由于西方新老殖民主义者向中国大量偷运鸦片，致使鸦片流毒愈演愈烈。“鸦片烟性最酷烈，食此者能骤长精神，恣其所欲。久之遂致戕贼躯命，大为风俗人心之害”(《清仁宗实录》卷二二七)。“鸦片烟一项，由外洋流入内地，蛊惑人心，戕害生命，其祸与鴆毒无异”(《清仁宗实录》卷二七一)。对鸦片危害的深刻认识，使嘉庆朝始终采取严厉的禁毒政策。为本清源，嘉庆朝一方面制